

隐喻视角下组织管理理论建构的整合多元主义方法

盛思鑫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北京, 100038)

摘要: 理论建构中所使用的隐喻具备可拓展性, 这种可拓展性来源于喻体系统和本体系统之间的映射关系, 并且透过喻体和本体间的类比推理可以产生新的能被检验的假设。基于对喻体和本体(研究对象)关系的不同认识, 可将组织管理领域常见的理论建构方法分为三种: 工具主义、批判实在论和多元主义。使用这三种方法来构建理论的研究者大多数对于隐喻的使用都是下意识的, 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人类思维的隐喻性质和概念系统的隐喻本质。从隐喻思维的角度看, 用来构建理论的三种方法各有优缺点。运用整合多元主义这一新方法来建构组织管理理论, 可综合已有方法的优点, 同时尽量克服它们的不足。该方法一方面认同工具主义提出新喻体的理论倾向, 力求通过分析综合已有理论的隐喻基础来构建新喻体; 另一方面也肯定批判实在论对更强解释力的追求, 主张新喻体应尽可能吸收已有喻体之间的共同点。此外, 整合多元主义还借鉴了多元主义“兼容并包”的研究路径。隐喻思维视域下整合多元主义方法的使用既有助推进组织管理理论的创新, 也能为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提供启示。

关键词: 隐喻; 工具主义; 批判实在论; 多元主义; 整合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 F2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1-0095-12

包括组织管理学学者在内的很多社会科学家都不愿意承认, 理论建构需要使用隐喻和隐喻思维, 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隐喻的不精确性与理论建构应当严谨精确的要求背道而驰。这种看法混淆了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与作为思维方式的隐喻。现代认知语言学的一大成果是发现了人类思维的隐喻性质, 即我们总是需要依靠熟悉的意象去认识和理解相对陌生的事物^{[1],[2](18)}。不同于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 理论建构中所使用的隐喻具备可拓展性, 这种可拓展性来源于喻体系统和本体系统之间的映射关系, 并且透过喻体和本体间的类比推理可以产生新的能被检验的假设^[3-4]。由于受到这种映射关系的严格限制, 理论建构中的隐喻思维便有了逻辑约束与明确边界, 这使得它有别于修辞隐喻, 而可以被称作“理性的想象”(disciplined imagination)^[5-6]。

由于本文讨论的是理论建构方法, “理论是什么”便成为一个前置性问题。不幸的是,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莫衷一是, 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可从理论的功能这个角度去理解“理论是什么”。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论述堪称最有影响力的回答之一, 而他对“理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带有浓厚的隐喻色彩。波普尔说: “理论是一张我们为了捕获‘世界’所抛出的网; 也是为了去解释、掌握世界, 以及为了将世界加以合理化所抛出的网。我们的工作, 就是要将这张网的缝隙编织得越来越细密。”^[7] 本文采用波普尔对理论的这一界定, 并指出隐喻是理论的基础, 而且理论这张捕获世界(研究对象)的“网”由隐喻所支撑的概念体系所组成, 还包括在概念体系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分类学和过程模型等。

收稿日期: 2024-03-01; 修回日期: 2024-12-02

作者简介: 盛思鑫, 男, 湖南常德人, 哲学博士,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组织管理、认识论, 联系邮箱: sixinsheng@foxmail.com

从理论建构的具体实践来看,社会科学理论对隐喻的使用集中体现在对研究对象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过程中^[8]。例如,社会学理论语言中经常使用“机器”“有机体”“生态”“系统”等隐喻,这些隐喻实质上反映了对“社会”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9]。尽管隐喻思维在组织管理研究中必不可少,但学者们在建构理论时对隐喻的使用却常常是下意识的,因此反倒妨碍了对隐喻思维的充分利用。有鉴于此,下面首先以组织隐喻理论为例,介绍隐喻思维在组织管理理论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再对隐喻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回顾,指出现有文献多数局限于从隐喻的角度分析或比较已有理论,鲜有组织管理领域的学者有意识地利用隐喻思维建构新理论。本文将从隐喻视角出发,分析工具主义、批判实在论和多元主义这三种已有理论建构方法的优缺点,并提出“整合多元主义”这一新的理论建构策略。为促进“整合多元主义”这一新方法在组织管理领域内的运用,本文将还讨论理论建构应该如何分步实施,并提供具体的操作示例。

一、组织管理理论中的隐喻思维:以组织隐喻理论为例

在组织管理理论中,组织隐喻理论是认可和重视隐喻思维价值的少数理论之一。和其他组织管理理论关注具体的组织情境和管理实践有所不同,组织隐喻理论致力于探讨各种组织理论和管理实践的隐喻基础。例如,一谈起“组织”,每个人都对“组织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具象的认识,即利用隐喻思维将组织当成某种具象的存在。有人说“我是组织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言外之意即“组织是在建的大楼”。有人自称是“组织的螺丝钉”,其潜台词即“组织是机器”。隐喻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核心构成内容,对隐喻的有效使用有助于启发学者们用新的视角去看待、理解和概念化各种组织现象,这意味着隐喻思维在组织理论创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0]。

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理论领域,组织隐喻理论肇始于1979—1980年在《管理科学季刊》上发表的若干具有开创性的论文^[11-13]。组织隐喻理论认为任何组织理论的创立者与管理实践的提倡者均对“组织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即将组织看作某一喻体^[11, 14]。摩根(Gareth Morgan)鉴别和归纳了一系列喻体,用以区分不同的组织理论及管理实践^{[15](6-7)},包括机器、有机体、大脑、文化、政治系统、心灵监狱(psychic prison)、流变和转换(flux and transformation)及统治工具(instrument of domination)等,见图1。如: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者和信奉者倾向于认为组织是机器。提倡关注组织健康的经理人实质上将组织视为有机体。沿着摩根的这一思路,组织理论的研究者应该努力提出新的组织喻体,从而从更多的角度去探索和认识组织的不同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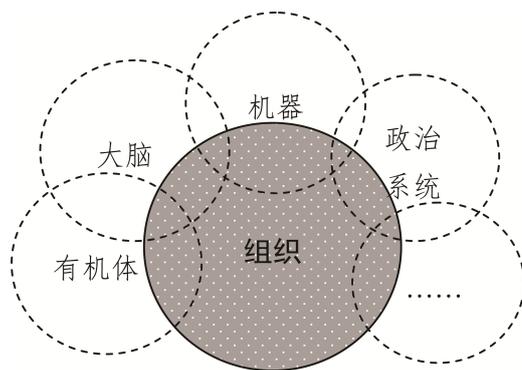


图1 摩根的组织喻体示意图

和图1中的那些组织喻体相比,斯格特(W. Richard Scott)提出了三个比较复杂的组织喻体:理性系统(rational system)、自然系统(natural system)、开放系统(open system)^[16],如图2所示。以“理性系统”为例,这一组织喻体可以被看作“理性组织”和“组织系统”这两个喻体组合形成的复杂隐喻^[17]。通过这种组合而形成的新喻体实质上为研究者解释组织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斯格特等指出,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开放系统这三大理论视角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各种组织现象,并且可以通过复杂的组合方式(如开放的理性系统、开放的自然系统)形成新的理论视角,从而为组织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解释^{[18](108-115)}。斯格特等的研究说明,除了像摩根那样直接提出新的组织喻体之外,还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现有喻体的复杂组合来建构新的组织喻体。

概言之，组织隐喻理论揭示了隐喻在组织管理理论中的基础性作用。事实上，社会科学领域所有的理论都离不开隐喻。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发现，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概念和话语体系本质上都建立在若干隐喻的基础上^{[2](40)}。更进一步说，思维也具有隐喻的性质，因为人类总是需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来进行思考^[4]。换言之，人们需要借助已有的体验与认知(喻体)才能去认识未知(研究对象)，或是加深对另一已知现象的认识^[10]。从这个角度看，隐喻是内嵌于人类理性思维中的基础性方法，同时也是认知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工具^[19]。具体来说，人类的认知活动是在一定的框架内进行的，而这个认知框架的搭建离不开已有的喻体知识^[20]，其中涉及的概念、文字或象征物都可引致人们情绪的发生或改变^[21]，即形成所谓的激发效应(priming effect)，从而对认知和决策产生较大影响^[22]。举例来说，人们之所以在读到优美的文句时会产生良好的情绪，是因为联想到了过往的美好体验。而在优美文句的背后，正是已有的喻体知识(即相类似的体验)为激发效应提供了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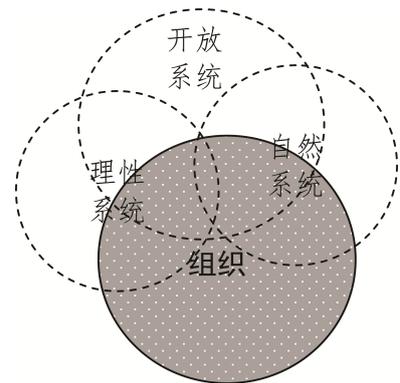


图2 斯格特的组织喻体示意图

综合来看，当前组织管理学界对隐喻思维在认知和行为中的重要性已经略有认识^[23]。例如，一些研究者指出，隐喻在理论建构与理论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19, 24]。但是，组织隐喻理论和其他重视隐喻思维的社会科学研究均有一个显著缺陷：在进行理论建构与理论创新时，学者们在充分利用隐喻视角方面缺乏理论自觉，大体上仍止步于从隐喻角度对已有理论进行梳理、分类或比较^{[11], [15](8), [18](86)}，或是侧重于介绍隐喻视角及其在组织研究中的具体应用^[23-26]。因此，下面将从隐喻视角对组织管理领域常见的理论建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并分析这些方法的优缺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建构方法。

二、隐喻视角中的理论建构：已有的三种方法及其局限

基于对喻体和本体(研究对象)关系的不同认识，可将组织管理领域常见的理论建构方法分为三种：工具主义、批判实在论和多元主义。如前所述，尽管理论研究者们对隐喻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一，甚至可能将作为修辞的隐喻和作为思维方式的隐喻混为一谈，但隐喻思维在理论建构中的确具有普遍性与不可或缺性。

结合查尔默斯(A. F. Chalmers)对科学哲学的诠释^{[27](214-215)}，隐喻视角下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在理论建构方面的立场可阐述如下：隐喻只是用来认识研究对象的理论工具，尽管隐喻并不精确，本身却无所谓对错。例如，将组织看作一部机器，只是方便对组织这一研究对象进行理论研究，而讨论“组织是否真是一部机器”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其中的逻辑，类似于物理学在讨论自由落体问题时，落体的速度之所以和质量无关，是因为假设了落体在真空环境中只受重力作用。事实上，绝对的“真空环境”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它只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近似。但是，这并不妨碍“真空环境”下的自由落体公式的科学性，因为它仍可有效预测“非真空环境”中落体下降的距离或时间。在这个背景下，讨论“真空环境”是否真的存在对于理论建构来说毫无意义^[28]。工具主义者建构理论的方法可以用韦恩图(Venn diagram)说明。如图3所示，只要喻体a、b、c和研究对象有交集(即存在部分重叠)，隐喻便能够成为建构有效理论的基础。换句话说，喻体不必也无法做到和研究对象完全拟合，只要它们能够捕捉到研究对象的部分特征，就在理论建构方面有价值。

不难发现, 前述摩根的研究思路便属于典型的工具主义。根据工具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和发展理论的过程实质上是在喻体 a、b、c 之外找到更多其他的隐喻, 并据此提出新的理论。但任何一个喻体和研究对象可能形成交集的部分总是有限的(即无法做到互为子集), 因此其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力总是有限的。工具主义的一大优点是容易操作, 这使得该方法被广泛运用, 但缺点是据此发展出来的有关研究对象的理论过多过杂, 而且这些理论各自满足于在特定领域内对研究对象所形成的有限认识, 不同的理论间很难相互比较或进行对话。这不仅不利于知识的融通, 也容易导致有关研究对象的各种理论的片面化和碎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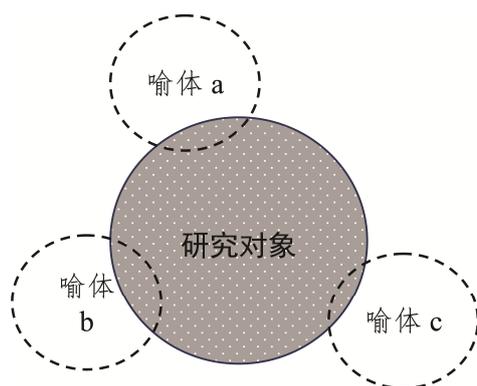


图3 理论建构的工具主义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工具主义的本体论是“反实在论”(anti-realism)^{[27](215-217), [29]}。反实在论认为现象世界是客观的, 并将其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可以通过人的感官直接观察到的现象, 另一部分是不可直接观察的客观实在。反实在论强调, 我们只能根据直接观察到的部分提供科学的认知, 对于不可观察的部分则无能为力。研究者们就客观实在不可直接观察部分所提出的各种理论, 仅是用来预测间接可观察数据的一种工具, 并不是对客观实在不可观察部分的科学反映。理论描述与客观实在是否相符不仅无关紧要, 也无法得到充分证实。在这样的本体论之下, 工具主义在认识论方面强调科学知识受制于人类的观察能力, 通常更倾向于使用归纳法和还原论(reductionism), 认为针对可观测数据总是存在大量不同且不兼容的理论解释, 并且可观测数据对各种理论的验证均是不充分的, 因此比较两个理论谁更有效缺乏意义。

组织管理领域第二种常见的理论建构方法可称为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结合阿克罗伊德(Stephen Ackroyd)的界定^[30], 隐喻视角下的批判实在论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倾向: 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理论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近似, 并且存在对研究对象更好的近似。如此一来, 不同的理论便可在解释力上一较高下。比较而言, 前述斯格特的理论立场与批判实在论更为接近。尽管斯格特认为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开放系统适用于不同的组织或组织内的不同现象, 但是在这三大理论视角内部, 不同的理论之间存在着竞争, 而且有时也可以分出优劣。例如, 在理性系统视角内部, 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理论推崇“自下而上”的理性化管理, 同时代的法约尔(Henri Fayol)的管理理论则提倡“自上而下”的理性化管理, 而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同属于理性系统视角, 给予了前两种理论最为彻底的批判: 无论是组织的决策者“上层”或是执行者“下层”, 他们的理性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都是有限的理性^{[18](53-56)}。

根据批判实在论的逻辑, 如果喻体能够捕捉到研究对象的更多特征, 那么将有助于建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因此, 理论发展的过程便是一个次优的喻体被一个较优的喻体所取代的过程。如图4所示, 喻体 a2 和研究对象的交集是喻体 a1 和研究对象交集的真子集, 因此喻体 a1 要优于 a2。从喻体 a2 到 a1, 就是理论发展的过程。批判实在论的优点是可以指示清晰的理论发展路径, 并且可对已有理论进行比较和扬弃。在理论创新方面, 批判实在论的缺点在于可操作性不强, 毕竟提出能够超越旧理论的新理论并非易事。工具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各有其拥趸。但不论是工具主义的理论间不可比较, 还是批判实在论的理论间可比较, 在隐喻层面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解释: 喻体之间是否有共同点是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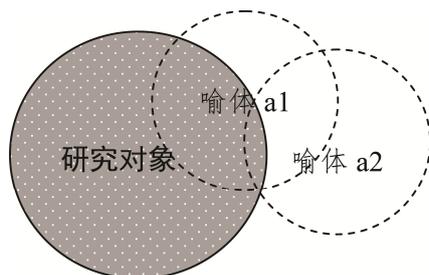


图4 理论建构的批判实在论

响理论之间可否比较和对话的重要因素。

就本体论而言，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是“实在论”(realism)^{[27](219-222), [31](70-74)}。实在论强调现象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知的客观实在，是“不变的实在对象”(unchanging real objects)。研究的目的在于为这个客观实在提供尽可能精确的理论，从而可以描述、解释和预测客观的现象世界及其发展。这些理论，包括其描述、解释和预测均是人为的产物，同时被视为“变动的认知对象”(changing cognitive objects)。正是由于批判实在论持有这样的本体论，它在认识论方面便更倾向于使用演绎法和整体论(holism)，力求提供精确的和系统性的理论^[26]。批判实在论认为理论的“变动性”源自研究者在知识背景、认知深度和历史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和局限，具体表现为理论观点的不同，甚至是理论间的对立。因此，所有的理论都必须经过对比和批判以实现修正或改进。

第三种理论建构的方法是多元主义(pluralism)。与跨范式方法^[32-33]的研究倾向类似，多元主义认为能够建构有效理论的喻体都各有价值，应从多个喻体的角度去认识研究对象，尽量克服单一理论的片面性。细分起来，多元主义有两条不同的实现路径。第一条路径可称为“求同存异”，重点关注不同喻体在拟合研究对象方面的共同之处。如图 5 所示，所谓“求同存异”，指喻体 a、喻体 b、研究对象这三者的交集为非空集的情况下，这一交集便可发挥桥梁的作用，使得建立在喻体 a 和喻体 b 基础上的理论可以对话，从而更好地认识研究对象。同样，喻体 c、喻体 d、研究对象这三者也存在非空集的交集，因此建立在喻体 c 和喻体 d 基础上的理论也有交流的基础。但是，由于喻体 a 和喻体 c 之间、喻体 b 和喻体 d 之间、喻体 a 和喻体 d 之间、喻体 b 和喻体 c 之间均不存在交集，在此情形下便无法走“求同存异”的路径。多元主义的第二条实现路径“兼容并包”相对来说更为常见。这一路径主张尽量综合不同理论的解释力，进而丰富对研究对象的认识^[26]，如在图 5 中，“兼容并包”即指对喻体 a、b、c、d 各自与研究对象的交集求一个尽可能大的并集。因为“兼容并包”常常止步于对已有理论进行简单综合，所以在为研究对象提供新理论或更为深入的解释方面作用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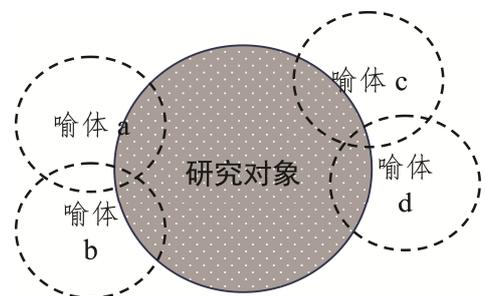


图 5 理论建构的多元主义

在组织管理领域，近年来的不少文章^[34-35]都应用多元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或比较已有理论的异同，并试图提出一个求同存异或兼容并包的理论框架。例如，在道德领导力(moral leadership)的研究领域中，鉴于伦理型领导力(ethical leadership)、诚信型领导力(authentic leadership)、服务型领导力(servant leadership)三种主要流派在理论上的混淆以及实证研究方面的重叠，有文献深入分析了这三种流派对领导力的概念理解和关注重点，并找出了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而倡导研究者从互补的视角出发去拓展对道德领导力的研究(图 6)，即主张兼容并包的理论路径。从优缺点方面看，多元主义的理论建构方法有助于缓解工具主义带来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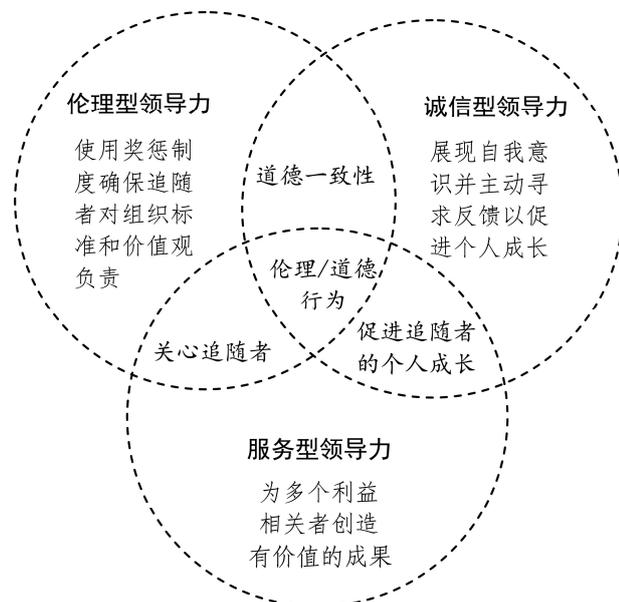


图 6 理论建构的多元主义示例(Lemoine, Hartnell & Leroy)

论建构方法有助于缓解工具主义带来的理

论过度繁殖问题,从而减少冗余性知识的产生。与批判实在论比较,多元主义的可操作性要更强一些。尽管工具主义因其实用性而成为最流行的理论建构方法,但多元主义在学术界的使用也较为广泛。不过,多元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并没有提出新的喻体,这使得它在理论创新方面有一定的局限。

多元主义的本体论是“建构实在论”(constructive realism)^{[31](330-336)}。建构实在论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实在”(reality):实在自身(actuality)与建构的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建构实在论强调,对于实在自身我们无从真正把握,有关实在自身的命题均只是对其特性提出的假设,研究者们能够理解和研究的只有建构的实在,即由价值观念、社会规则与人际互动等建构出来的日常世界^[36]。在认识论方面,多元主义认为,各种理论只是对建构之实在的某种简化,因此对各种不同的理论进行综合与加总,有利于促进对建构之实在的理解与认识。不难看出,多元主义的认识论在本质上属于还原论。由于理论也被看作建构之实在的一部分,因此不同理论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解释、相互借鉴对于更好把握建构之实在便显得尤为关键。如前所述,多元主义存在“求同存异”和“兼容并包”两种不同的理论路径:前者在认识论方面更强调通过不同理论之间的交流,促进对理论世界这个建构之实在的理解,进而促进对日常世界的理解;后者更强调对不同理论解释力的直接综合,以此促进对日常世界这个建构之实在的理解。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使用工具主义、批判实在论、多元主义三种方法来构建理论的研究者大多数对于隐喻的使用都是下意识的。换言之,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人类思维的隐喻性质和概念系统的隐喻本质,工具主义和批判实在论者甚至对隐喻的“主观性”存在刻意的回避与恐惧^{[37](279-287)}。但是,有意识地检讨隐喻思维在组织管理理论中的使用,确实有助于理解已有理论和促进理论创新^[10]。

三、整合多元主义:组织管理理论建构的一种新策略

基于上述对工具主义、批判实在论、多元主义三种方法的分析,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构建方法,并将其命名为整合多元主义(integrative pluralism)。该方法一方面认同工具主义提出新喻体的理论倾向,主张通过分析综合已有理论的隐喻基础来构建新喻体;另一方面也推崇批判实在论对更强解释力的追求,主张新喻体应尽可能地吸收已有喻体之间的共同点。以图7为例,整合多元主义可以在喻体a和b的基础上构建喻体ab,使得喻体ab既与喻体a和研究对象的交集构成交集关系,又与喻体b和研究对象的交集构成交集关系;或者构建喻体cd,使得喻体c和研究对象的交集以及喻体d和研究对象的交集均是喻体cd和研究对象交集的子集。从集合关系的角度看,喻体ab和研究对象的交集,与喻体a、b和研究对象的交集,构成互不包含的交集关系。喻体cd和研究对象的交集,与喻体c、d和研究对象的交集,不仅有交集,而且后者构成前者的真子集。相比喻体ab“整合”喻体a和b,喻体cd在“整合”喻体c和d上做得更好,但构建喻体cd的难度往往比构建喻体ab的难度更高。由于新喻体ab(或新喻体cd)吸收整合了喻体a、b(或喻体c、d)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力,借助这一新喻体构建的理论便可兼具已有理论的部分(或全部)优点,同时能提供新的分析角度与解释框架,并为已有理论提供交流对话的平台。为了分析上的简便,图7只列举了较为简单的情形。在应用整合多元主义的过程中,也可能发展出喻体abc、abd、abcd等情形。如果原有喻体的数量增加(如从图7中的4个增加至5个或6个不等),那么整合多元主义提出新喻体的可能性也会提高。通常而言,在提出新喻体时,试图整合的喻体越多,研究的工作量就会越大,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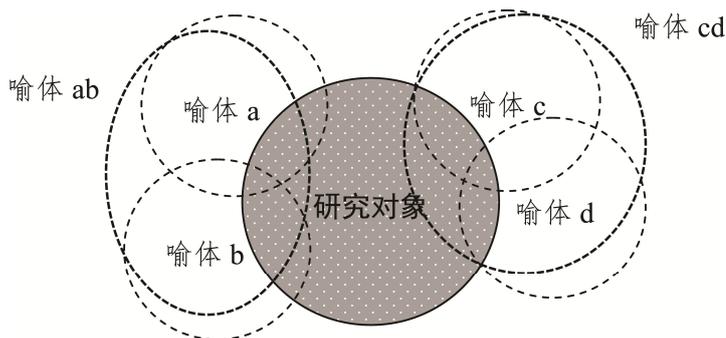


图7 整合多元主义

究难度也会越大，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理论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力也会越强。

与工具主义、批判实在论、多元主义相比较，整合多元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工具主义的研究倾向。相反，它肯定了工具主义的实用性，并借鉴了工具主义的理论创新方式。与此同时，整合多元主义也认同批判实在论对更优理论的追求，并为这种追求提供了一条较为可行的实现路径。整合多元主义还吸收了多元主义的理论构建方法，与多元主义“兼容并包”的研究路径较为接近。因此，整合多元主义的“整合性”不仅体现为整合了已有理论的喻体基础，而且表现为综合了前述工具主义、批判实在论、多元主义等方法的优点。但是，整合多元主义并不完美，它最突出的局限便是高度依赖已有理论的隐喻基础去构建新的喻体，这意味着整合多元主义在理论构建方面不属于“原始创新”，而是一种对已有理论的“集成创新”。这种创新虽有助于促进“范式融合”，但却不能直接推动库恩(Thomas S. Kuhn)所言的“范式革命”^[38]。此外，由于整合多元主义与多元主义容易混淆，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差别。首先，整合多元主义在已有理论基础提出了新的喻体，并据此发展出新的理论，而多元主义并没有提出新的喻体，所以严格说来也没有提出新的理论。其次，整合多元主义主张回到已有理论的隐喻基础层面去考虑理论创新，因此对已有理论之间的兼容性与异质性认识较为深刻，而多元主义对已有理论的兼容性和异质性分析往往停留在表面。最后，整合多元主义提出的新理论不仅在解释力上要优于已有理论，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新框架可用于比较和分析已有理论。相比之下，多元主义只是对已有理论解释力的一种简单综合，并没有为已有理论提供比较分析的框架。

在本体论层面，整合多元主义的立场可以概括为“整合实在论”(integrative realism)。整合实在论认为，现象世界是“客观实在”和“建构实在”的复合体，研究者们无法将二者截然分开，任何声称仅研究客观实在或建构实在的理论，对于现象世界的理解都失之偏颇。整合实在论强调，所有理论究其本质都是隐喻性质的，因为研究者需要基于眼耳鼻舌身等经验性的观测和体认(如人对机器的观察)去理解更为抽象的客观实在(如人对组织的思考)^{[37](37-41)}。同时，借由这种隐喻思维构建出来的理论本身也属于建构实在的范畴，故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切理论既有“客观实在”的成分，也有“建构实在”的成分。在认识论层面，整合多元主义强调通过不同理论之间的整合与融合而形成新的理论，而多元主义并不强调提出新理论，这也是二者在认识论上的显著差异。与批判实在论的理论追求相似，整合多元主义倡导对现象世界提出更加全面系统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但是，批判实在论所推崇的理论突破或范式革命只是对理论发展史的一种事后总结，对理论研究本身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导，而整合多元主义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方法去实现批判实在论的理论追求，因为关于同一研究对象的任何两个理论都可以在隐喻基础上进行整合，而且整合出来的新理论相对原有的被整合的理论，在全面性和系统性方面都有进步。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考虑，当涉及同一研究对象的理论数量非常之多时，整合多元主义并不追求一次性地整合所有理论，而是主张从少到多、从易到难的渐次性整合。在认识论层面，整合多元主义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即任何理论都只可能揭示研究对象的有限特征，但能够反映研究对象更多特征的理论要优于那些反映更少特征的理论。与此同时，相对真理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逼近绝对真理的过程，尽管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揭示研究对象的所有特征，但理论的发展可以无限接近绝对真理^[39]。

四、整合多元主义之实现步骤与操作示例

(一) 整合多元主义之实现步骤

一般而言，在理论建构时，可从下述四个步骤着手去实现整合多元主义。

第一步：由于理论的基础是概念，而概念的基础是隐喻，隐喻又依靠概念中的关键词来支撑，因此首先需要收集整理同一研究主题的代表性文献，然后围绕同一研究主题中的核心概念，全面梳理不同的概念界定，找出概念界定中所使用的关键词，然后从中识别出高频关键词。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

文献的概念界定,应当有意识地使用隐喻思维,将概念与具体的研究情境结合起来,这样也有助于对文献和概念进行合理的分类。

第二步:不同概念界定中的高频关键词反映的正是不同的概念界定在“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的共识,而且这些共识与“研究对象”的拟合度可能也较高(参考图7中喻体a、b、c、d与研究对象重叠的部分),因此可以依据这些高频词(共识)再去勾勒和想象“研究对象”的特征(即构建图7中喻体ab或喻体cd的隐喻思维过程)。在第一步工作的基础上,便可依据不同概念界定中的高频关键词发展出一个整合性的概念界定(参考图7中喻体ab或喻体cd的界定)。由于这一新构建的概念界定整合了已有文献中的概念界定,新概念基础上的理论也将具有较强的整合性。

第三步:根据这一新的概念界定发展有关研究对象的新分类学,从而拓展这一新的概念界定在不同领域的适用性;或者在新的概念界定或新分类学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有关研究对象的过程模型,如行为过程模型或决策过程模型等。这一新的概念界定、分类学及过程模型便可构成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第四步:基于新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可以检讨现有理论,并促进不同理论间的对话,从而实现理论成果的整合与拓展,另一方面可以根据新的研究问题提出新的命题,从而发展出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新理论,以进一步拓展对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的认识。此外,新理论与已有理论也可以进行对话。

在实践整合多元主义时,上述四个步骤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示意,并非标准化的研究流程,也并不需要将四个步骤完整地体现在研究者的行文中,文章的结构与编排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在组织管理的特定研究领域,有志于推进整合性研究的学者通常对该领域的概念和理论等比较熟悉,因此可以按照整合多元主义的实现步骤直接开展研究,并不一定需要细致探讨每一个概念和理论背后的隐喻基础。但如果能对隐喻思维有意识地进行辨析和利用,将十分有助于促进对已有理论的认识并增强新提出理论的创新性。相较而言,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更需要想象力,对隐喻思维主动且充分的利用有助于研究者形成跨学科的理解。

(二) 整合多元主义之操作示例

为更好地说明如何实现组织管理领域内的整合,下面选取战略执行领域的一项整合性研究^[40]作为示例。当前,社科领域对整合性研究日益重视。例如,国际顶级期刊《美国管理学会年鉴》(*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近年来高度关注组织管理领域内的知识碎片化现象,自2019年以来发表了至少40篇旨在促进知识整合的文章,占该期刊同期发文总量的约30%。在这些文章中,部分文献采用的是多元主义的理论方法^[34-35,41],即侧重于分析比较已有理论及其概念界定等方面的异同,主张综合已有理论的解释力,但没有提出新的概念界定、分类学和过程模型;一些文献在已有理论基础上仅提出了新的概念界定^[42]、分类学^[43]或过程模型^[44],不能较好地完整反映出整合多元主义的理论构建方法。综合来看,一项关于战略实施的整合性研究^[40]比较符合整合多元主义的理论建构方法,不仅分析比较了已有理论的核心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概念内涵与外延,进而发展出了新的过程模型。

该研究^[40]指出,在战略实施研究领域,传统的结构性控制理论关注如何将战略执行计划进行概念化处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形成最优的结构、制度、激励和控制手段。而新近的适应性理论更侧重于研究组织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如何理解、制定和调整战略。鉴于战略实施领域知识的碎片化问题,该研究主张将结构性控制理论与适应性理论整合起来,形成新的战略实施理论,从而促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对应整合多元主义实现步骤的第一步,作者们首先在10本高影响因子的管理学期刊的文章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搜索“战略+实施”和“变革+实施”,再从搜索结果中剔除那些并非聚焦战略实施的论文,然后将剩下的论文普遍共引的文献加进来,最后得到185篇代表性文献,其中88篇属于传统的结构控制理论观,97篇属于适应性理论观。基于对这些文献的阅读分析,作者们系统梳理了不同文献对战略实施的概念界定,从中识别出在界定战略实施概念时不同文献所使用的核心高频关键词(即图8中的“战略概念化”“战略执行”“战略行动协调”)。

对应整合多元主义实现步骤的第二步，根据结构控制理论与适应性理论不同文献中的概念界定中的核心高频关键词，提出一个新的整合的概念界定(见图 8)：战略实施是“是战略概念化、战略执行和战略行动协调这三个相互关联活动的持续相互作用，这些活动使组织能够通过组织利益相关者的集体行动来实现战略”^[40]。其中，战略概念化指的是产生并持续重新评估组织战略方向的活动，既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制定战略及战略的实施计划，也包括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及参与者；战略执行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所形成的战略实施方式，既涉及多个不同参与者的行动，也涉及参与者在各自的环境中理解和调整特定战略时的互动；战略行动协调指的是那些旨在协调战略实施的有意识的行动，以及人们为实现集体行动而相互依赖地完成目标和任务的社会动态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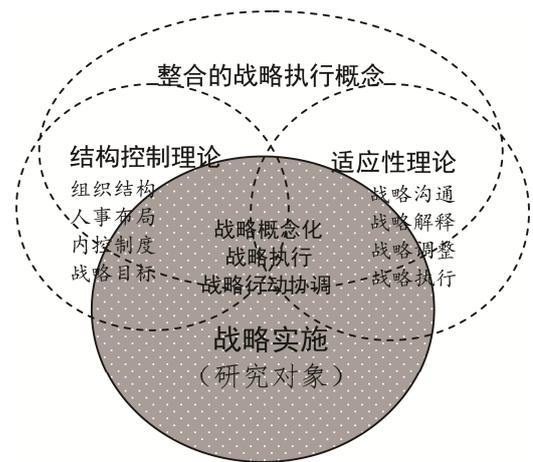


图 8 整合的战略执行概念示意图

对应整合多元主义实现步骤的第三步，在上述概念界定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有关战略实施的整合性过程模型(见图 9)。一方面，该模型强调当不同的组织行动者交互地执行一项战略时，常会引发各种适应性的行为出现。战略执行和适应行为的这种相互作用循环往复，并导致持续的行动整合。另一方面，该模型强调一个更为根本和更为长期的反馈回路，即从战略执行到战略(再)概念化的反馈回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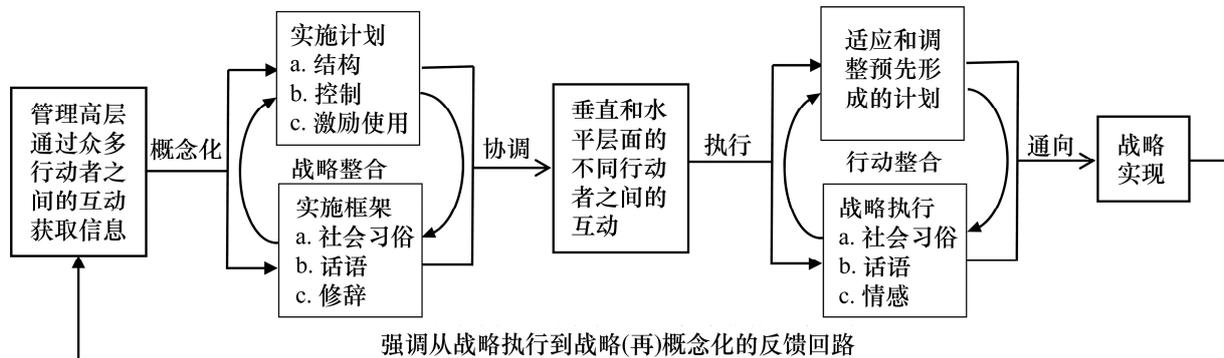


图 9 战略实施的整合性过程模型示意图

对应整合多元主义实现步骤的第四步，基于有关战略实施的新概念界定及整合性的过程模型，作者们不仅提出了战略概念化与战略执行的相互影响、不同组织行动者的作用、战略行动的协调等未来研究的新命题和新方向，而且发展出了可用于研究战略实施的注意力理论(attention-based view)、进化论(evolutionary theory)、心理学理论(psychological theories)等新视角，构成了对已有视角的有益补充。

五、结语

相比批判实在论，工具主义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更为普遍。因此，围绕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往往给出不同的概念界定。但是由此产生的不同理论之间的壁垒或混淆问题，经常造成大量冗余知识以及理论间无意义的争论，不利于知识积累、知识传播与理论发展。尽管多元主义的理论方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在实践中却容易沦为对已有理论的简单综合，因此也很难提出新的理论。工具主义、批判实在论、多元主义之所以存在这些局限，主要是因为它们忽略甚至否认隐喻思维在理论建

构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所提倡的整合多元主义强调理论思维的隐喻性质,并且认为隐喻基础的不同是导致理论差异的重要原因。整合多元主义倡导对不同理论的隐喻基础进行整合与重构,从而形成新的整合性隐喻。在新的隐喻基础上建构出来的新的整合性理论既可以融合并吸收已有理论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力,又具备较强的对现有理论的总结、综合与归纳能力,同时还可推动现有理论的交流与发展,有助于改变不同理论各说各话的离散局面,并且可以促进和激发研究者提出有关研究对象的新描述、新解释、新预测,从而丰富和更新组织管理领域的认知。对于有志于开展理论创新的研究者而言,整合多元主义是一种有效的理论建构新策略。

近年来,组织管理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整合性的研究议程,少数学者还开展了具体的研究实践。除了前面列举的整合性研究之外,还有国内学者提出,应当综合考虑组织的物理、伦理、生物、理性、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特征,从而构建整合性的组织隐喻,在此基础上可对组织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对中国本土的组织现象而言,儒家文化的家庭隐喻正是构造这样一种整合性组织隐喻的理想选择^[45]。另有学者基于对自然、经济、社会和网络等空间的特征整合,构造了新的组织空间概念模型,从而区分了组织的价值行为空间与利益攸关空间,并强调在其中获取战略价值空间是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46]。在专业价值观研究方面,有学者整合历史制度理论和专业理论等,对专业价值观做了新的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由专业活动历史实践与专业价值观形成的动态交互模型^[47]。但这些文献很少探讨整合性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因而限制了这些领域的其他学者继续深入整合,也很难启发其他领域开展整合性研究。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很大程度上源自研究者低估了隐喻在理论建构中的作用,故而最终在理论方法上很难摆脱工具主义、批判实在论或多元主义的思维框架。本文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明晰了整合多元主义与三种已有理论构建方法的联系与差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整合多元主义的操作步骤,为组织管理领域内的整合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如上所述,组织管理领域内的知识整合已经有了少数实践。相比之下,社会科学跨学科领域的知识整合更难,大多还停留在偏哲学讨论的层面^[48-49],整合多元主义的应用实例非常少。此外,由于学术界固有的学科分类意识以及对研究领域的类属定位,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际上也处于一个较边缘的位置之上。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学者虽普遍认同跨学科视角的重要性,但在认可和接受这类研究时却难免受到自身学科与专业训练的影响。从组织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看,组织管理领域中的很多理论均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溢出”,而隐喻思维及整合多元主义为组织管理领域对其他学科的“知识反哺”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换言之,组织管理学者如果能有意识地充分利用隐喻思维,将会更好更快地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从而促进真正的跨学科认识与理论运用。在此基础上使用整合多元主义所构建的新理论,不仅有助于组织管理领域的知识进步,而且也有助于组织管理领域和其他学科领域的对话交流,甚至有可能促进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进步和理论创新。此外,单单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建构方法,整合多元主义也可以为组织管理领域外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提供理论创新的路径,这既包括某一社会科学领域内部的整合性研究,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的知识整合。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4-6.
- [2] COOPER D E. *Metaphor*[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86.
- [3] STEINHART E C. *The logic of metaphor*[M].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 [4]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M]//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2-251.
- [5] WEICK K E. Theory construction as disciplined imagin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16-531.

- [6] CORNELISSEN J P. Making sense of theory construction: Metaphor and disciplined imagination[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6, 27(11): 1579–1597.
- [7] 约阿斯, 克诺伯. 社会理论二十讲[M]. 郑作彧,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9.
- [8] 黄华新, 邱辉. 知识管理与隐喻认知[J]. *科学学研究*, 2014, 32(11): 1698–1704.
- [9] SWEDBERG R. Using metaphors in sociology: Pitfalls and potentials[J].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020, 51(2): 240–257.
- [10] BOXENBAUM E, ROULEAU L. New knowledge products as bricolage: Metaphors and scripts in organizational theo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2): 272–296.
- [11] MANNING P K. Metaphors of the field: Varieties of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9, 24(4): 660.
- [12] KEELEY M. Organizational analogy: A comparison of organismic and social contract model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0, 25(2): 337.
- [13] MORGAN G. Paradigms, metaphors, and puzzle solving in organization theor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0, 25(4): 605.
- [14] 盛思鑫. 组织理论和管理实践的隐喻基础: 文献述评[J]. *南国学术*, 2017(4): 692–702.
- [15] MORGAN G. *Images of organization*[M]. Thousands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6.
- [16] SCOTT W R.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M].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3.
- [17] CORNELISSEN J P, KAFOUROS M. The emergent organization: Primary and complex metaphors in theorizing about organization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8, 29(7): 957–978.
- [18] SCOTT W R, DAVIS G F. *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ing: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 perspectives*[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7.
- [19] 李醒民. 隐喻: 科学概念变革的助产士[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 26(1): 22–28, 21–110.
- [20] FAUCONNIER G, TURNER M.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J]. *Cognitive Science*, 1998, 22(2): 133–187.
- [21] TVERSKY A, KAHNEMAN 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J]. *Science*, 1981, 211(4481): 453–458.
- [22] KAHNEMAN D. *Thinking, fast and slow*[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50–58.
- [23] 潘剑英, 王重鸣. 生态系统隐喻在组织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 30(3): 65–69.
- [24] 罗珉. 基于哲学视角的组织隐喻研究前沿探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9, 31(4): 1–9.
- [25] 郝丽风, 李晓庆. 复杂性隐喻及其在组织研究中的应用[J]. *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 2011, 8(4): 9–16.
- [26] 罗珉. 组织的隐喻: 从现代到超现代[J]. *管理学报*, 2005, 2(6): 660–665.
- [27] CHALMERS A F.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M].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9.
- [28] FRIEDMAN M.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A].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3–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 [29] OKASHA 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8–59.
- [30] ACKROYD S. Critical realism, organiz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reconfiguration[M]// *Elements of a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0: 47–77.
- [31] 黄光国. *社会科学的理路: 思源版*[M]. 新北: 心理出版社, 2018.
- [32] GIOIA D A, PITRE E. Multiparadigm perspectives on theory build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0, 15(4): 584–602.
- [33] HASSARD J. Multiple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 case study[J]. *Organization Studies*, 1991, 12(2): 275–299.
- [34] LEMOINE G J, HARTNELL C A, LEROY H. Taking stock of moral approaches to leadership: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ethical, authentic, and servant leadership[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9, 13(1): 148–187.
- [35] CUTOLO D, FERRIANI S. Atypic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in organizational and market setting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4, 18(1): 157–209.
- [36] NEUMAN W L.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7: 89.
- [37] 雷可夫, 詹森. 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M]. 周世箴, 译注.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
- [38]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92–93.
-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94–95.

- [40] WEISER A K, JARZABKOWSKI P, LAAMANEN T. Completing the adaptive turn: an integrative view of strategy implement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0, 14(2): 969–1031.
- [41] DEB P, SREEKUMAR V, SEN P, et al. New venture governance: An integrative, multidisciplinary review[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4, 18(2): 831–861.
- [42] KNIGHT A P, GREER L L, DE JONG B. Start-up teams: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ualization, integrative review of past research,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0, 14(1): 231–266.
- [43] ERTUG G, BRENNECKE J, TASSELLI S. Theorizing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multiplexity: An integrative typolog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3, 17(2): 626–654.
- [44] VUORI N, BURKHARD B, LAAMANEN T, et al. Heuristics in organizations: Toward an integrative process mode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4, 18(2): 670–711.
- [45] 胡国栋. 中国本土组织的家庭隐喻及网络治理机制: 基于泛家族主义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10): 97–109.
- [46] 冯海龙, 刘俊英, 闫星烁. 空间组织隐喻下公司空间及其次序解构与演化[J]. *管理学报*, 2020, 17(2): 186–195, 268.
- [47] 王彦, 贾良定, 宁鹏. 专业价值观的构建: 历史、实践与理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6(2): 87–96, 107.
- [48] 威尔逊. 知识大融通[M]. 梁锦鋈,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6.
- [49] 伯克. 知识社会史: 下卷[M]. 汪一帆, 赵博因,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An integrative pluralistic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eory construction from a metaphorical perspective

SHENG Sixin

(Chinese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Metaphors employed in theory construction possess extensibility, which stems from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ource domain and the target domain, and through analogical reasoning between the two domains, new testable hypotheses can be generated. Based on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hicle and tenor (research object),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ethods commonly used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approaches: instrumentalism, critical realism, and pluralism. Researchers employing these three methods often use metaphors subconsciously, without fully recognizing the metaphorical nature of human thinking and the metaphorical essence of conceptual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ical thinking, each of these three theory-building methods has it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new method—integrative pluralism—in constructing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eories can synthesize the advantages of existing methods while attempting to overcome their limitations. This approach, on the one hand, acknowledges the theoretical tendency of instrumentalism to propose new vehicles, striving to construct new metaphorical vehicles by analyzing and synthesizing the metaphorical foundations of existing theor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affirms critical realism’s pursuit of stronger explanatory power, advocating that new vehicles should incorporate commonalities among existing vehicles wherever possible. Furthermore, integrative pluralism draws upon the “inclusive” research path of pluralism. The utilization of integrative plur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ical thinking not only helps advance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eory but also provides insights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other social science fields.

Key words: metaphor; instrumentalism; critical realism; pluralism; integrative pluralism

[编辑: 郑伟]